

# 从周树人到鲁迅

张永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鲁迅所以为鲁迅，关键在于他对传统文化前无古人的独到认识和深刻批判。鲁迅的名字永远是同『狂人』『阿Q』联系在一起的。



# 从周树人到鲁迅

张永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周树人到鲁迅/张永泉著. —新1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10

ISBN 7-80186-575-8

I. 从... II. 张... III. 鲁迅(1881~1936)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4539 号

责任编辑 郑月林

装帧设计 王小阳

## 从周树人到鲁迅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7.75 插页 3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575-8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新版自序

我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从出版到现在,已有一个年头了。东方出版中心希望我进行修订,由他们重新出版。修订再版,这是我早有的想法。记得书当初出版后,曾有十几位学界同仁写文章进行评介,我还曾收到远在异地、素昧平生的读者写来的热情肯定的信,有的还在认真阅读后把书寄来,要我签名留念。这些都使我在感到欣慰,惭愧之余萌生了将它细化、深化的想法,并且构想出了新设章节的提纲。但由于种种内在外在的原因,终于未能如愿。如今想来,着实后悔。此次交稿时间在即,我的写作速度又实在太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原有的构想。情急之下,只是加写了第三章。归国后至《狂人日记》问世的十年是鲁迅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的十年,但也是促使鲁迅思想发生重要转折,促使周树人成为鲁迅的十年。在鲁迅研究中,迄今为止这十年仍然是个空白。因为史料阙如,研究起来着实困难。但探讨“从周树人到鲁迅”,对此不能不谈。本书初版时,我就觉得没有这一环节是个重要的缺憾,所以,不管谈得深浅,这次还是写了出来。另外,关于鲁迅早期思想同“从周树人到鲁迅”的关系,我也曾设想了一章。现在只能将其中的一些想法在这里简要地谈谈。

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新时期以来无疑成绩最为辉煌,其标志是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终于还原了一个本真的思想家鲁迅。当然,研究者并没有忽略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客观事实,但人们恰恰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发现了他对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深刻的思想,认识到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而是以文学形式面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

大作用主要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思想。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是,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两次重要突破都是通过对他的小说《呐喊》、《彷徨》和散文诗《野草》的研究实现的。前一突破还原了鲁迅启蒙思想家的真实面貌,后一突破发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而这两次突破以及众多研究者为他们做出的多方准备和由它们引发的多方辐射式的研究深入,则将路标一步步指向鲁迅本体。到世纪之交,鲁迅本体论研究也就随之而出。

“本体就是最后的实在、依据”。<sup>[1]</sup>一个人的本体就是某人所以为某人的最后的实在,最终的依据。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化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新时期以来,作为对“左”倾思想否定、压抑人的自然本性行为的强烈反拨,谈到人性,人们往往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甚至用它来代替人性。其实自然属性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除了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人之所以为人,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是因为人有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人之本体,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实在,最终的依据。这当中,社会属性又是主要的。所以,作为社会的人,一般来说,每个人的本体都主要是由他的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社会存在决定的。这就是他的社会本体。这是社会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本体。但人类历史上有些特殊的人物,除了社会本体外,还有另一种本体。比如鲁迅,作为风格特异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有他的社会本体,但作为具有风格特异的人生哲学的伟大思想家,又有他的形上本体、哲学本体。因此,对鲁迅本体的探索也就从这两方面展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注意力从鲁迅小说转向鲁迅思想,特别是鲁迅早期思想。但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我没能像后来的年轻一代的学者那样以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为参照观照鲁迅早期思想从而发现鲁迅的主体论哲学,而主要是从自己的人生感受出发,从当时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强烈追求出发,去审视鲁迅的早期思想,结果从中发现了一系列悖论。由此我感到鲁迅早期思想与“五四”时期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他当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五四”时期的思想深度。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一边重读鲁迅的文字,一边放开视野,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读章太炎、读严复、读吴虞、读周作人……在深入的阅读与思考中,我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上,鲁迅

早期与“五四”时期有明显的不同。鲁迅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还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人的个性、扼杀人的精神,也就是狂人所指出的“吃人”的本质,因而表现出明确的眷恋与维护的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复古的倾向”。<sup>[2]</sup>而“五四”时期的鲁迅,则明显地由复古走向了反复古,由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维护走向解构与批判。这就使我明确了这样的认识:鲁迅所以为鲁迅,关键在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独到认识和深刻批判,在于他对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所做出的只能属于他的重要贡献。这就是我对鲁迅何以为鲁迅以及鲁迅是怎样成为鲁迅的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就是我对鲁迅本体的探寻。当然这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探寻,所探得的也只是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鲁迅本体。

8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的学者以他们得天独厚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的理论视野观照鲁迅,推动鲁迅研究实现了视角的转移。他们将目光由鲁迅的外在世界转向鲁迅的内在世界,从鲁迅的作品——特别是《野草》中发现了为鲁迅所独具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将鲁迅研究从文学层面推进到哲学层面,从社会学、历史学层面推进到存在论、本体论层面。对鲁迅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本体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研究的启示有关。这样,鲁迅就在世人面前展示出两种本体:社会学本体和哲学本体,形下本体和形上本体。相对而言,形而上的显得深刻而富有魅力,形而下的显得平实但更为可信。现在看来,两种本体探寻都有待完善,我现在并且认为,两种探寻最终应合而为一,探寻出一个完整的鲁迅本体,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这当中对有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特别是更为确切的探讨。但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两种本体探寻能不能趋于融合?

曾有研究者认为,有关鲁迅的既有的说法:反封建、启蒙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都不能有效地概括鲁迅。倘从某一个角度揭示鲁迅的思想属性或历史片断,这些说法才是有效的,而用做一个思想家范型的描述,则是模糊的,无法从中建立一个独特的精神轮廓。即使是在这些命题前加上程度副词“最”,也不能让人知道“最”在何处。况且这些主义的程度、高深度之“最”者不一定就是鲁迅,他并不是这些主义的典型代表。因此应该另辟蹊径,寻找鲁迅更为个性化的规定性。这种看法,最早其实来源

于李泽厚。李泽厚论鲁迅时曾说：“鲁迅后期并没有成功的小说，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深度和嬉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对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胡适说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但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肤浅的胡适并不理解这句话。只有鲁迅，才真正身体力行地窥见了、探求了、呈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孤独。”<sup>[3]</sup>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先驱，李泽厚影响了几代中华学人，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两次重要突破，都同他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关于鲁迅的独特的超越启蒙的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的论述，至今仍启示着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但我觉得他在这里还是把问题绝对化、简单化了。为了强调鲁迅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他在不经意间淡化了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独特性。鲁迅后期杂文如《二心集》中的一些篇章，“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确“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但那只能算鲁迅全部杂文中的平庸之作，在经历了革命“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周扬们的皮鞭之苦重新找回自我后，三本堪称“血书”的《且介亭杂文》不仅瞿秋白、冯雪峰绝对写不出，而且渗透其间的那种深刻的孤独悲凉的人生感受和对历史与现实的鞭辟入里的洞察，恐怕也不会出自第二人的手笔。其实，鲁迅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与激烈批判是融为一体的，这一点在《呐喊·自序》中说得很清楚。正是从日本归国后风雨如磐、无情地碾碎他青年时代浪漫理想的社会现实和他自己不得不随时咀嚼的浸泡在苦酒中的人生滋味儿，使他产生了传统文化铸造的老中国犹如一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闷死人的铁屋子的强烈感受，也正是这种强烈感受才有了令中国人感到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没有鲁迅自己所说的“寂寞”——今天的研究者所概括的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便不会有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认识和激烈批判，而又正是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认识和激烈批判，不断加深着他的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可以说，这种人生感

受和深刻批判互为因果、相辅相成,都只属于鲁迅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他人。不论是首先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对传统文化施加猛烈批判的陈独秀,还是继起的胡适、钱玄同、吴虞,甚至曾经与鲁迅思想颇为一致的周作人,都是如此。让我们对颇能表现鲁迅文化批判独特性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再做分析。谈到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表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他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意见,却很少注意他这种意见产生的前提——即他所强调提出的看中国书时的感受。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种阅读感受既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又来自他切实的人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是“天人合一”。这个“天”具有自然与天帝的双重内涵。天人合一既包括着人对自然规律的主动适应与遵循,又意味着人对上天的被动的敬畏和顺从。特别在人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哲学中更注重后一点。由此出发,中国人追求人生的平衡、和谐、稳定和宁静,而回避矛盾和冲突,否定冒险和毁灭。人生一切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都被读书人消融在修身养性、静观平宁和独自逍遥的自我超越之中。这使得中国文化缺乏西方文化所固有的悲剧精神,而铸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大团圆心理。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人生境界和人生美学。鲁迅所说的读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真切感受就源于此。正是这种真切的感受强化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悲凉,然而也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孤独与悲凉才使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那令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闻之变色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话。我们读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批判中国文化的文字,也能从中感到一定程度的深刻和激烈,但却体会不到为鲁迅所特有的那种感受。比如钱玄同,他也发表过“两千年来用汉字写出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因而须“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sup>[4]</sup>这样激烈的言论,但他对中国书却缺乏鲁迅那样真切的阅读感受,因而批判起来也就缺乏相应的力度。曾经和鲁迅并肩作战一起批判传统文化的周作人把鲁迅批判中国书的表态说成是“立意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sup>[5]</sup>则说明他更缺乏鲁迅那样的感受。

对鲁迅本体形而上层面的探寻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

为参照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这种探寻的理论先导和理论依据。毋庸置疑,鲁迅精神世界中那浓重的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与存在主义有惊人的相通之处,并且其源头之一就来自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克尔凯廓尔和尼采。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鲁迅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存在主义。他的孤独悲凉的现代人生感受不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的。鲁迅接受克尔凯廓尔、尼采的影响是在日本留学时期,由于家庭精神基因的遗传特别是家道中落途中受世态炎凉的刺激,不能说当时他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一点孤独悲凉的因子,但就其主流来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sup>[6]</sup>而他正是以这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精神界战士自许自命的。克尔凯廓尔、尼采那呈现出强有力的孤独悲凉色彩的个性主义经过他的咀嚼消化变成了他浪漫主义激情的强大动力。然而归国以后上至国家动荡下至个人苦闷融会在一起强加给他的炼狱般的生活无情地冻结了他这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把他推向了寂寞的深渊。他的孤独悲凉的人生感受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得到强化的。这与克尔凯廓尔、尼采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萨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存哲学产生的外在缘由并不相同。不论克尔凯廓尔还是尼采,他们都是因为强烈地感受到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生存虚无而激发了自己抗击并超越虚无、寻找并重建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想追求。他们的后继者海德格尔和萨特则更进一步,致力于穿透虚无之门并进而探寻重建人生价值和意义之路。不难看出,虚无和抗击虚无可谓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主题词,存在主义因虚无而产生,围绕虚无而不断深化。鲁迅的情况则与此不尽相同。诚然,“五四”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鲁迅头脑中也有着人生虚无的强烈感受,这并且影响了他绝望意识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的产生。但是,鲁迅的绝望意识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并不仅仅发端于对人生虚无的体悟,而更导源于对社会黑暗的深切感受和自己在这一强大的黑暗面前的无力与无奈,而且鲁迅对人生虚无的体悟也直接导源于对社会黑暗的深切感受和自己在这一强大的黑暗面前的无力与无奈。谈到自己投身新文化运动前的思想状况,他曾说过:“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

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sup>[7]</sup>很显然,他的绝望心态是由辛亥革命后反动派开历史倒车的黑暗社会现实引发的。对此,他后来在与许广平的交流中曾有非常明白的表述。他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挑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sup>[8]</sup>这是鲁迅对解读他的作品和思想的最好的提示,是“五四”时期鲁迅的“文眼”。鲁迅首先所强调的还是“黑暗”,现实的黑暗,社会的黑暗,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黑暗。这种黑暗像无处不在的“鬼打墙”,像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包围着鲁迅,幽禁着鲁迅,使鲁迅一度深深地陷入以抄古碑来消磨生命的绝望之中。鲁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老朋友钱玄同的鼓动下提起笔投入“五四”启蒙运动,就是为了反抗这黑暗,打破这黑暗。可以说,反抗黑暗是鲁迅的人生选择,人生实践,“五四”时期是如此,30年代同样也是如此。后来他曾对许寿裳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原,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要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sup>[9]</sup>正是对现实与传统的黑暗的深刻而激烈的批判,造就了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当然,鲁迅不仅反抗黑暗,也抗击虚无。其实,在鲁迅身上,对黑暗与虚无的感受是融为一体的。“这以前,我的心也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sup>[10]</sup>这“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就是当年反抗黑暗社会的斗争实践,然而现实与传统融为一体的强大的黑暗犹如巨大的黑洞,将这一切都吞噬掉消融掉,使得这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一切都变成空虚,化作虚无。特别是那更大的黑暗——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国百姓尤其是读书人精神支柱和理想追求的“仁义道德”的假象被戳破后,心中的价值大厦轰然坍塌,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片价值废墟,一切都是假的,空的,一切都是虚无。而虚无与黑暗反而呈现为“实有”。这使鲁迅更深地陷入虚无的强烈感受之中。仔细体味,在鲁迅这里,“虚无”有着双重内涵。首先,虚无是外在的,是黑暗孕育了虚无,同时,虚无又是内在的,是鲁迅面对黑暗与虚无所产生的人生虚无的感受。

在鲁迅的心目中,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黑暗与虚无的世界。这虚无与黑暗如影随形,但又难于把握,“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废墟中舞蹈,看见污秽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做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sup>[11]</sup>不难看出,在鲁迅的感受中虚无与黑暗是紧密相连的。然而也正是对虚无的深切体悟,更加深了鲁迅对黑暗的切肤感受。鲁迅要反抗这黑暗,超越这虚无,重建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然而他又深感这反抗与超越之难。“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但他举起了投枪。”“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sup>[12]</sup>鲁迅心里清楚,反抗的结果,仍是一片虚无。所以,他把这称为“绝望的抗战”。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举起了投枪”。鲁迅就是这样,反抗黑暗,同时也抗击虚无,与黑暗同生同存的虚无。

我对鲁迅社会学本体的探寻落实在“五四”,具体来说,落实在鲁迅酝酿构思《狂人日记》的1917年。我认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社会学本体诞生的标志。这样,我就更多地看到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悖论。这使我在对鲁迅早期思想的认识与评价上同对鲁迅哲学本体进行探讨的研究者出现了分歧。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与这些研究者认识上一致的一面。其实,在我的认识中,鲁迅早期思想对鲁迅本体的形成是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的。在谈鲁迅早期思想悖论时,我曾专门谈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双重效应,指出鲁迅早期所确立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个性主义思想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人生实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只是因为放在思想悖论的框架内来谈,其重要意义被冲淡了。因此这里我要专门谈谈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价值。由于在家庭败落的过程中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对庸众的劣根性有着刻骨

铭心的感受,这使他对当时在日本流行的尼采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目光投向了正在欧洲广泛兴起的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与民主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物极必反,科学与民主的负面效应也急剧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就是其工具理性造成对人尤其是个人的严重挤压,从而造成人新的异化。面对物欲横流、众庶专制造成的价值迷失、个性沦丧,以尼采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高扬个性主义的旗帜,提倡个人至上、自我实现。年轻的鲁迅以他特有的敏感把握住了这一重要思潮的精髓。根据自己的理解,他把这一精髓概括为“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sup>[13]</sup>所谓张灵明,即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sup>[14]</sup>所谓任个人,即张扬人之自我,“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sup>[15]</sup>总之,“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sup>[16]</sup>值得注意的是,以尼采为代表的这股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先河的社会思潮虽然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样都张扬人的个性,但在这一点上比起前两次要表现得更为激烈、更为彻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把人从神和封建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针对的是占少数地位的压迫者,解放的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人性。为此,它要求建立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现代主义思潮则不然,它针对的是造成人新的异化的工具理性,横流的物欲,将人拉向平均化、低俗化的大众,以及这一切造成的社会的虚无,人的精神的虚无。这当中,也包括反抗者自身。这就要求反抗者必须要有绝对清醒的意识,绝对坚定的自我。这使它必然要把个人推向极至,推到与社会与公众相对立的地步。从反庸众的思想心理出发,鲁迅对此极为赞赏,完全认同。仔细梳理,可以看出鲁迅从这股思潮中吸纳了这样三层思想:一、人的个性乃世界之本,至高无上。他肯定德国哲学家斯契纳尔(今译施蒂纳)“极端之个人主义”的思想主张,认为人“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sup>[17]</sup>二、为了坚守个性,张扬自我,必须敢于抗拒外界的任何压力。他张扬易卜生的“反社会民主之倾向”

和尼采的“超人之说”，称颂他们“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为极至”。<sup>[18]</sup>他尤其赞赏尼采关于超人与庸众的关系的主张，认为“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虽然，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sup>[19]</sup>三、为了做到这些，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特别欣赏尼采等人的这种独特品格，因而强调指出：“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义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碚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如勸宾霍尔（今译叔本华）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为世界之本体也；尼佉（今译尼采）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今译易卜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迁万众不懾之强者也。夫诸凡理想，大致如斯者，诚以人丁转轮之时，处现实之世，使不如是，每至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楨干。排斥万难，黽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sup>[20]</sup>

我今天仍然认为，鲁迅早期思想是个充满矛盾充满悖论的复杂体，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他对以尼采为代表的这股社会思潮的摄取对他的思想、性格的积极影响。正是尼采这类思想家的这种被推向了极致的个性主义，给鲁迅早年由家庭熏陶、社会阅历的影响所形成的性格、气质、心理乃至思维方式注入了理性的因子，从而铸造了近现代中国独一无二的鲁迅性格。不用说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可以从这里找到精神的源头，就是鲁迅“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出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刻激烈的批判，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性格上的保障。十年沉默期间，他所以在那炼狱般的生活煎熬中没有沉沦，没有被黑暗的社会所消融，而在孤独悲凉的寂寞中坚持思考、坚持探索，为后来的横空出世做好坚实充分的理论思想准备，无疑与这种个性主义相关。“五四”时期他所以敢于通过狂人之口喊出中国历史吃人，通过阿Q的形象画出中国人的灵魂，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提出要少或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也与这种个性主义相关。更重要的是，他所以对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人的认识高人一筹、无人能够企及,所以对中国社会能够产生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样的感受,同样与这种个性主义密切相关。鲁迅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同时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对公众的态度。不可否认,鲁迅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有着深切的关爱,但对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庸众,不论是由“上等人”“聪明人”组成的庸众,还是由被压迫被损害者组成的庸众,他都决然持守对立的态度。他说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sup>[21]</sup>这可谓“夫子自道”。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敢于攻击社会,但对于独战多数,却缺乏鲁迅那样的孤独感受和思想力度。诚然,胡适也欣赏易卜生独战多数的人生态度,尤其欣赏易卜生借他的作品的主人公之口所说的这句话:“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sup>[22]</sup>但他并没有像鲁迅那样把这句话化为自己的灵魂。所以今天有的人常常把胡适和鲁迅拿来对比,赞赏胡适宽容,指责鲁迅刻薄。的确,对于庸众、庸俗,鲁迅态度刻薄,甚至刻毒。但这正是鲁迅的独特之处,鲁迅所以深刻之处。其实,敢于攻击社会并不难,意欲革新社会者大都能做到,但敢于独战多数者却举世绝少,因为太难太险。一个人来到世上,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只能在社会中生存。最可怕的不是饥寒交迫,不是社会体制的压制,而是世人的冷眼,大众的唾沫,群体的挤压,那才是精神上的虐刑,心理上的扼杀,让人无处躲藏,无法喘息,无力求生。对此鲁迅深有体会,以至不断发出这样的感慨:“民众的罪恶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sup>[23]</sup>“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才安心了”。<sup>[24]</sup>所以,“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sup>[25]</sup>这使得那些敢于迎着大众的冷眼和唾沫而上的人在为真理而战时不能不产生浓重的孤独悲凉乃至人生荒谬人生虚无之感。鲁迅就是如此。然而正是这种感受,使他对讲伦理、重群体、轻个人的中国文化的严重弊端有了切肤之痛的体验和直逼本质的认识。鲁迅对中国文化、中国人不仅是认识,还有感受,他的深刻认识来自他切肤之痛的感受,可以说,正是这种切肤之痛的感受才使他产生了超出他人的深刻认识。也可以说,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常认识,是以他对中国人生的超常感受为基础的。这正是鲁迅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包括周作人等同时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早期对以尼采为代表的

西方现代思潮的摄取,也就没有“五四”时期的鲁迅。读鲁迅的文本,不论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还是杂文,都能感到其中散发着一股浓重的孤独悲凉乃至郁悒忧愤之气。这正是那种“不和众器,独具我见”,“洞瞩幽隐,评鹭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侮,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憾也”<sup>[26]</sup>的个性主义使然,那种明知没有希望,但仍独战多数的个性主义使然。如果说,探讨“从周树人到鲁迅”意在说明鲁迅何以为鲁迅,那么,对鲁迅早期个性主义的探讨则可以回答鲁迅何以能够成为鲁迅、在中国何以只有周树人能够成为鲁迅。

然而我还是认为,尽管鲁迅早期思想对鲁迅本体的形成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不论是鲁迅社会学本体还是哲学本体,都形成于《狂人日记》的酝酿、写作时期,而不是他的早期。早期鲁迅是个“曾经做过许多梦”<sup>[27]</sup>的理想主义者,是个踌躇满志的个性主义者,是个豪情满怀的浪漫主义者。彼时的鲁迅还没有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人生感受,没有孤独寂寞的悲凉情怀,更没有满含悲剧意味的“中间物”意识,没有“前面是坟”的绝望心理和明知是坟却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悲壮精神。谈到十年沉默期间的寂寞和悲哀,他说正是这寂寞和悲哀使他反省,看见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sup>[28]</sup>从这后来的自我否定也正可以推测出他当年的英雄梦想。我还是同意汪晖的分析和论断:“鲁迅像尼采、基尔凯廓尔等人一样,把个人、个人的主观性、自由本质、反叛与选择置于思考的中心,把摆脱精神偶像和超越一切道德法律束缚作为孤独个体的特征。但如果将鲁迅的理解与加缪对尼采的阐述加以比较的话,明显的区别便是加缪对人的自由和存在意义的思考,充满了令人心醉的痛苦和荒谬感,而鲁迅此时却更强调‘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不移’,‘排斥万难,黽勉上征’的坚强意志——鲁迅对人的关注服从着他对中国社会解放的思考,而《野草》时期经历了多次失望后的‘绝望’心态此时还远未出现。这样,对个体的关注和对个体超越性的理解就给鲁迅的文化哲学带来兴奋的浪漫主义色调,而个体存在的悲剧性的、甚至荒诞性的主观精神结构本身,并没有构成他的主体论哲学的主要思维内容。”<sup>[29]</sup>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鲁迅当时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个性主义的摄取主要还停留于理论的层面,而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现实的层面。他还

没有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社会现实面前不断碰壁,同时,他也还没有切准中国社会的脉象,没有准确把握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没有洞彻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而回国后家事国事永无休止的困扰,则无情地把他的思考推向了现实的层面。这使他从人生感受到心理状态、从文化选择到人生取向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激昂飞扬的浪漫主义到冷静深沉的现实主义,从追求光明、志在必得到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从踌躇满志、昂扬奋进到孤独忧愤、寂寞悲凉,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维护到决绝反戈、激烈批判。而促成他这一重要转变的主观心理因素,则是他当年对西方个性主义的摄取,是和他原有的性格融为一体的个性主义。正是这强有力的个性主义,催生了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使他由绝望走向反抗绝望,也正是这强有力的个性主义催化了他孤独悲凉的人生感受,并由这人生感受中洞见了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从而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为他所特有的传统文化批判。可以说,正是早期对西方个性主义的摄取,为“五四”时期鲁迅哲学本体、社会学本体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一基础,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社会实践,没有这一心理基础与后来的社会现实的反复碰撞,同样不会有后来的鲁迅,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搞清鲁迅是谁,他从哪里来,又走到了哪里。

鲁迅是谁?他从哪里来?又走到了哪里?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与追求?困惑与思考?逼拶与煎熬?绝望与奋起?《从周树人到鲁迅》探求的就是这些问题。但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也仍然是粗线条的,不完善的。

## 【注释】

- [1] 《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 2001 年对话录》第 279 页,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 [2] 《呐喊·自序》,本书所引鲁迅文字,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鲁迅全集》。
-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 111~112 页,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 [4]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
- [5] 周作人:1966 年 2 月 15 日致鲍耀明,《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
- [6] 《坟·摩罗诗力说》。
- [7]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 [8] 《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第 12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9]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前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 [10] 《野草·希望》。
- [11] 《华盖集·“碰壁”之后》。
- [12] 《野草·这样的战士》。
- [13] 《坟·文化偏至论》。
- [14] 同上。
- [15] 同上。
- [16] 同上。
- [17] 同上。
- [18] 同上。
- [19] 同上。
- [20] 同上。
- [21]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 [22]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精品集》第2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 [23]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 [24]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 [25]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 [26]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 [27] 同注[2]。
- [28] 同注[2]。
- [29]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99~10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